

都市文学的狭隘与突破

蒋成浩

城市是文明的象征,亦是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那里有着与乡土世界判然有别的生活;文学则储存着城市的记忆,建构并丰富着人们的城市经验与情感结构。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城市状况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晴雨表。因为文学的存在,城市的生命永恒化了,为后人提供了触摸历史、重构记忆的机会。中国自古就有城市文学书写的传统,《两都赋》《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们写朝廷典礼、市肆经纪、四时节物、教坊乐部,为城市注入了人文的观察视角,为我们理解当下的城市提供了参照的坐标。

与乡土文学的书写相比,都市文学的创作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未能达到与“乡土文学”企及的高度。都市文学发展存在的问题,既是当代文学的病症,也是城市发展和作家都市经验与都市审美陷入困境的表现。如何获取都市经验,如何理解城市,如何审美城市,如何书写城市,都是都市文学不断探索的课题。

按理说,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为作家提供了广阔的写作素材,而众多人口在时代发展大潮中的命运转向,也应能拓展都市文学表现的深度与广度。同样,举国范围内城市化征程,带来全新的城市文化与城市经验,这些都是都市文学得天独厚的条件。

实际上,当代都市小说,只有《长恨歌》《繁花》等少量

作品走向经典化。大多数都市小说呈现出过度“怀旧化”“日常化”的倾向,拆解了意识形态宏大叙事的功能,沉湎于“旧时王谢堂前燕”的时空喟叹与“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价值真空之中。

近年来兴起的“东北文艺复兴”“新南方写作”为人所瞩目,其主力多为青年作家,他们成长于中国城市化飞速发展的时代,自身经验与都市变迁同频共振,或许可以深化都市文学的品格。

再谈城市发展和作家都市经验与都市审美的困境。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中身份认同问题成为都市文学关切的命题之一。围绕着身份认同问题,产生了一些精彩的都市文学作品。但久而久之,都市文学却形成了固定的“城乡对立”的叙事模式,在作家笔下,乡土是精神的寄托,城市是罪恶的渊薮。城市的可能性与丰富性被掩盖了,只沦为作家观念的承载物。

当代都市文学,擅长书写两类人物,一是聚焦于知识分子在都市生活中的现状与思考,一是刻画底层市民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图景。前者常常凸显知识分子在都市物质生活中产生的精神危机,表达城市发展过程中道德与人文精神的沦落,无不反思批判精神;后者则受到后现代史学观、日常生活批判的影响,试图还原原生态的底

层市民生活,展现普通小人物在都市生活夹缝中的生存哲学。这两类都市文学主题,都不独属当代性的独创。

中国城市的当代性并未从都市文学中表现出来,城市仅仅作为故事发生的空间背景而存在,较好一点的作品也只是抓住了当代城市的某一面面,而缺少整体性的都市当代性的建构。造成这一症候的原因,与作家都市经验、都市审美的固化息息相关。

中国的城市化是骤然而起的,中国城乡发展之间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转移了都市文化的重心,造就了“都市乡土”的割裂性体验。此外,我们的都市体验表现出强烈的阶层意识,不同领域、不同身份的人对都市的体验感判然有别。都市始终是破碎的、隔阂的,都市经验之间缺少流通与融合的可能性。都市经验的狭隘性同样限制了都市审美的能力,都市审美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寻找都市与人之间的精神联结,寻找个体在都市的存在方式。

都市文学的发展,一方面离不开作家对都市生活体验的抽象性思考,作家如何拓展都市经验,如何把握都市当代性,如何建构起既有整体性又有独特性的都市观,是都市文学产生经典作品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文学与城市,始终是双向互动的,二者互为镜像。当代都市文学折射出的经验与审美的狭隘性、庸俗性,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城市发展中的症候。

采撷人文景观的别样风致

——《香看两不厌》之独特视角

孙 郁

北京的皇家园林,有许多神秘气息,深解它们也并不容易。读杜梨的散文《香看两不厌》(刊于《北京文学》2023年第3期),见到的是古都北郊奇特的一隅。作品将一个清寂的历史遗迹,连同那里的守门人,写得生气活现,有飘动起来的感觉。我由此知道青年一代的心绪,已经大不同于我们这些老人,他们在沧桑的路上,体验了别样的滋味。

这部散文的内容有多奇特性,一是故事的地点缠绕着数百年的风雨,让人浮想联翩的地方殊多;二是古路上走来的是一些现代感很磨的青年,他们安于平凡,“是散淡的人,不受野心的折磨”,快意工作在一个神奇之所。不追求卓越的人却有了卓越之气。

过去的文人写老北京的园林、古建,把玩心态里,有一点古诗文的意境在。但在杜梨这代人这里,底色虽相近,而凝视的对象却略有变化。没有遗老,没有士大夫,



颐和园佛香阁春色

归 去 来 兮

陈 年

中篇小说《归家》(刊发于《山西文学》2021年第7期)的故事源于我的姥姥和舅姥爷。

我和姥姥很亲,小时候喜欢躺在她身边听她讲故事。姥姥的多死在了走西口的路上,娘吞了大烟土,她和舅姥爷一夜间成了孤儿。亲戚把姥姥送到杨锡当童养媳,把舅姥爷送到铜匠铺当学徒。兄妹俩就这么活生生分开了,哥哥心疼妹妹,每年端午节跑到杨锡见妹妹一面。后来浑源县城发大水,铜匠铺没了,舅姥爷参加了解放军,一走几年,再后来跟着部队去了朝鲜。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他没有回到浑源,而是留在了丹东。浑源与丹东距离几千里路,山高水远路途遥遥,舅姥爷几十年都没有回来。

舅姥爷虽远在千里之外,却是姥姥的希望,家里遇到过不去的坎儿,给丹东写一封信,过几天就会收到一笔汇款。

1995年,舅姥爷退休后回来过一次,想在大同给儿子找一个媳妇,假如在大同结了亲,和山西的联系走动就更多了。可错过了几个女孩子的不合适。那时我在外地工作,没赶上家庭大聚会,只见到他们的合影。

2008年,姥姥去世,舅姥爷从丹东回来奔丧,老泪横流。葬礼上匆匆一见,几乎没有交谈。原以为他和浑源的联系就此断了。没想到2013年舅姥爷回故乡安排自己的后事。落叶归根,在外漂了这么多年,他把老伴的骨灰从丹东带了回来,百年后他也要回到浑源,守着家乡,守着离去的亲人。

老人身板硬朗,说话声音洪亮。只是出去多年,他已经忘了浑源话怎么说。他讲一口不纯的普通话,既不是丹东话,也不是山西话。我邀请老人到我家做客,我和孩子说,老舅姥爷是上过朝鲜战场的。孩子一晚上都围着老人,听他讲故事。为了切掉我方后勤供给,美国人的飞机除了扔炸弹还往公路上撒铁钉子。舅姥爷拿着大扫帚扫钉子,飞机就在头顶上盘旋。身边不断有战友牺牲。我看着老人的脸,那是一张饱经沧桑的脸,眼神坚定。

2015年,老人最后一次回到大同,次年他身患癌症,行动不便,不能回来了。2018年老人去世,他的孩子们送骨灰回浑源,才发现舅姥爷的骨灰竟然丢失。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大家十分伤心。二姨安慰舅姥爷的几

个孩子,老两口的魂早已经在地下和亲人相会了。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我在网上看到一些珍贵的影像照片。那段远去的岁月在我面前渐渐清晰起来。这也是我动笔的原因。我想为那个时代、为那一代老兵、为我的舅姥爷写点什么。

当我决定把姥姥和舅姥爷的故事写出来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没有这方面的写作经验,既没有在下乡生活过,更没有在军队战场的经验。姥姥和舅姥爷生活的那个年代对我来说完全陌生。且两位主人公都已经去世,我记忆里只有姥姥讲过的故事片段,很多场景、人物无法证实。还有舅姥爷的故事,他是一位抗美援朝老兵,可当年战场上的事,他讲得并不多。他是炊事兵,除了特殊情况,基本是在大后方。真刀真枪和敌人正面接触并没有。而小说中,为了衬托人物,是要有一些战斗场面的。那段时间我观看了大量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纪录片,收集整理志愿军老兵的文字资料来补充素材。

这个小说的时间线跨越80年,这么大的跨度,如果按照正常的时间顺序来写,必定情节拖沓,引不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因此我用了双线索,一条以舅姥爷回乡为线索,现实和回忆交织展开,既有当年王家的生活片段,也有战场上的兄弟情与生死故事。另一条是由“苏红”来讲述,采用的是第三视角,由她来讲姥姥家各个人物的故事,表面上看似似乎是两条线,可是他们的讲述在一些事件、人物和时间上会有交集,而且两条线相交以后,又沿着各自的轨迹往下延伸。

小说还采用了虚实相结合的手法。如果只是姥姥和舅姥爷的家族故事,显得单薄些,我加入了另一个虚构人物——新赞,开笔设下悬念,虚构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故事,小说中真正的施展已经牺牲在战场上,这么多年同是孤儿身份的新赞一直以施展的名义接济照顾如意妹妹一家。88岁时,老人自觉日子不多,为了帮战友实现当年给妹妹许下的愿望,踏上归家之路。

现在回头再看这个小说,还是有小瑕疵的,由于篇幅的原因,有些情节没有完全展开,新赞这个人物还不够丰满,也许它应该是一部长篇的体积。

双塔

山西日报

近日,“文艺报·凤凰书评”专刊两周年座谈会围绕书评的体制与标准展开讨论。理想的书评应该具有什么特征?学者、评论家、作家对文艺评论工作、图书推广工作深入思考,各抒己见。

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认为,当下每年出版的书籍如汪洋大海,而优秀的书评理能够起到导航、遴选的作用,为读者推荐优秀且有特点的书籍。

评论家、作家王尧坦言,在学术之上受益于许多前辈学者的书评文章,但当下名副其实的书评非常少,好的书评理应既是对书籍原著的阐述、介绍和传播,也是思想和学术的再生长,应该争取涉及文学和思想等方面重要的话题,起到引领和阐述的作用,参与学界重大的事件和活动。此外,书评的作者要拓展,媒体人、作家、艺术家、电影工作者都可以写书评,单一的作者不能带来书评的繁荣。

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认为书评是一种“理论语言”的革命,中国目前大多数学者写不了书评,因为写短文章是一种能力,一些学者只会对学术共同体说话,没有学会对大众说话。他希望能够看到大众化、直抒胸臆、言之有物的书评写作与言说方式。

面对当下书评大多为文学类书评的现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认为,这是基于当下其他学科书籍没有文学活跃,其他学科门类的书评与读者的距离较远。他赞赏一些媒体刊登的书评,不仅有观点、有思想,同时具有媒体性和公共性,每一位写书评的人都有专业背景,其共同性是面对大众读者。书评的寄身之处应该是大众传媒。

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认为,“批评即选择”,批评对象本身选择就带有倾向性,批评性、否定性的批评当然有意义和价值,但文学批评不是要把不好的东西找出来,文学批评本质性、建构性的工作应该是沙里淘金,在海量的作品中发现优秀文学作品的过程,有时候发现、肯定优秀的文学作品可能比“酷评”更难,如果认为作品本身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了,为什么要关注它?批评对象的选择本身意味着对作品价值的肯定和认可。此外,王春林呼唤批评文体的解放,他认为当下的批评文体越来越学院体、学报体,文体的解放也意味着写作者思想和精神的解放,理想的文学书评应该有思想、见解,在文体上也更为开拓。

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罗伟章坦言,希望读到“撞到心坎上”的评论,人的本性是喜欢听好话的,但好的评论应该从作品本身生长起来,对作品有深入的理解和真切的感觉,能够建立起一种视野,为写作者带来启发和觉悟,对日后的写作带来建设。

编辑手记

为浸润读者心灵而写

肖静娴

今日编发探讨何为理想书评的文章,其中多个观点以不同表达方式提到“书评要为广大读者而写”,这是对一些书评主要为创作者、为机构、为学术研究而写,脱离读者,偏离文艺创作本质规律的一个纠正。

当下,文艺评论已充分参与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网上购书、在线阅读,浏览推荐理由和作品评价已成为许多人的习惯;优秀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常引发全民热议;亲朋、同事交流中,不时听到大家就“写作能力提升、亲子教育、如何度过闲暇时光而议论该看哪些书籍。通过文学评论,人们获取各类信息,增进沟通理解,得到共同提升。显然,大众需要更多有指导意义、引发共鸣、答疑解惑的书评。若文学评论工作者与群众生活脱节,对大众欣赏文学作品所需、所想、所盼不了解或视而不见,写出的书评即使是专业的,说服力 and 公信力也不强。

文艺从人民中来,在人民中才有生命,文艺评论工作者的眼里不能没有大众读者,不仅要引导作家创作,还要更好地引领大众读者构建审美意识、提升鉴赏能力,营造优良社会风气。不要以为写书评就可以闭门造车,文学评论工作者应沉到人民和生活深处,以调查研究为基石,充分感知大众读者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发现他们的误区、偏颇、困惑,从问题出发,遴选书籍,选题立论,写出贴近读者,具有引导性、探计性、服务性的书评。敢于说出真知灼见,开门见山,言简意赅,不讲无关痛痒、蜻蜓点水、老生常谈之词。

一篇理想的书评,它理应具备疗愈能力,能够给读者一剂良药,使他们的判断能力和思考能力不走上下坡路或停滞不前;它理应具备共情能力,能够与读者平等对话,使他们产生阅读兴趣而愿意主动求知探索;它理应具备启发能力,能够给读者指点迷津,使他们在渴求进步又找不到方向的道路上豁然开朗;它更应具备激励能力,能够为读者注入信心,使他们认清生活本质后依然热爱生活,找到让心灵富足起来的力量。

站得高
沉得下
守得住

——徐剑与刘浏谈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肩负着国家书写的使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报告文学的文心始于何处?报告文学的第一次心脏搏动为谁触发?什么是报告文学作家在新时代应有的创作态度?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与报告文学作家刘浏二人的对话带来启发。

刘 浏:近年来,您特别倡导“守望中国文学的文心与元气”。为什么会有这样坚定的态度?您认为报告文学创作可以从中汲取哪些养分以及该如何做?

徐 剑:文心,就是初心。它是最早萌发的情志意志,也是“中有太古声”的精神气象。思想泉流,如果沿波讨源,则我们上可接太史公根脉,以其磅礴充沛的历史见识、文学知性和人生境界为标杆,让自己的内心激荡亘古豪情。自然,眼下最紧迫的任务,还是回到当下,沉下心来研究民众生活,接受并进入他们的话语系统;至于更高层级的期许,则是回归古典心意,回归高贵与纯净,回归中国化叙事,回归以人性为圆心,回归真实性,毫不动摇地坚持写出中国气派。

我觉得,报告文学的坐标就是《史记》的坐标,再远一点,就是《周南》《秦风》《卫风》《魏风》《郑风》的坐标,就是为百姓而歌、为百姓而哭,虽颂犹哭。这也是一种文心和元气,所以,我们讲文心和元气就离不开写国之大事,离不开写民族魂,离不开写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离不开写新时代。

刘 浏:您的“三不写”原则——“走不到的地方不写,看不到的地方不写,听不到的地方不写”将“追求真实”摆在创作最醒目的位置。然而,绝对的真实根本不存在,只有相对的真实。您如何理解报告文学要讲真话的?

徐 剑:这个“三不写”是一名报告文学作家说真话、写真文、表达“真善美”必不可少的环节。当我们面对一名采访对象时,他其实已经在对所发生的故事细节和人生重新进行叙事,这种叙事会让我们对他的真实性打一个问号。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强调一本书的采访,如果不记录五六个采访本,我是不敢轻易着手的。比如,一件已发生的事会有N个版本,我们只有把所有采访对象都采访完了,把各个版本放在一起综合分析,才可能不会“上当”,才不至于被虚构的或者人为夸大的修饰所迷惑,从而才能有自己的独立判断。

“说真话”的作品才是会长久的作品。比如司马迁对刘邦的书写,既写了他的政治抱负,也写了他的性格弱点,再比如对李广的书写,既说出了他的长处,也说出了他的短。我认为说真话,特别是在大题材的把握上,一定要是辩证的,有长就有短,有阴就有阳,有对就有错,有成绩就会有缺点,我们应该把这些阴阳、对错、长短、善恶的东西写出来。

刘 浏:报告文学作家具备“多合一”的身份,是采访者、叙事者、知识分子,也是行动派、逆行者、时代的记录员……您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好这多重身份的?

徐 剑:报告文学与时代同频共振,从没缺席过任何一个重大历史时刻。同时,一些作家过分追求效率,创作失重了,依赖材料和文献,语言表达枯燥直白。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刘 浏:报告文学作家有负责完成重大题材写作任务的担当,更重要的是文学上的担当,即能拿出配得上这个时代的皇皇大作,与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时刻书写相称的作品的担当。我讲个自己的故事:《金青稞》采访写作前,西藏自治区扶贫办发来150万字的材料,我把所有材料看完后,基本没得到几条线索,所有的线索和采访都得自己到现场去,依靠自己独立的立场、独立的眼光、独立的发现和独立的解释。我没有用二手材料,二手材料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背景,一条线索。至于语言表达的枯燥直白,解决这一问题要从《诗经》《史记》《战国策》《左传》开始,回到中国史传文学、报告文学的初心和原点,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无法完成国家、民族、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本版编辑整理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

“赵树理文学奖”获奖者创作谈 ⑪